

■张海明著■

HUIGU YU FANSI

回顾 与 反思

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

I36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5

ISBN 7-303-04433-7

I. 回… II. 张… III. 古典文学-文学理论-研究-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6505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75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字数：220 千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11.00 元



张海明，云南昆明人，1957年生。198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4年获北师大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的教学与研究，著作有《经与纬的交结》、《林下风韵》、《玄妙之境》等。

RAF02/08

目 录

学术研究需要反思	蔡钟翔 (1)
引言	(7)
第一章 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8)
一、早期的古代文论研究	(19)
二、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的研究	(26)
三、新时期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	(32)
第二章 古代文论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44)
一、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性质	(45)
二、对象与目的	(51)
三、研究方法	(59)
四、研究主体	(64)
第三章 对中国古代文论特性的认识	(69)
一、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70)
二、古代文论体系的特征	(74)
三、文学本论特征	(81)
四、文学分论特征	(87)
第四章 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	(94)
一、从“民族化”到“中国特色”	(96)
二、走出误区	(104)
三、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113)
第五章 走向比较诗学	(123)

一、八十年代以来的比较诗学热及其原因·····	(123)
二、中西比较诗学的历史与发展·····	(130)
三、比较诗学和古代文论研究·····	(143)
第六章 资料整理 ·····	(153)
一、资料的收集·····	(153)
二、资料的考订·····	(159)
三、资料的编选·····	(165)
四、资料的释译·····	(172)
五、资料的利用·····	(177)
第七章 史的编撰 ·····	(184)
一、七十年来批评史撰写的实绩·····	(185)
二、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	(194)
三、增强学科自省意识,促进批评史研究的深化·····	(203)
第八章 专题与范畴研究 ·····	(216)
一、研究的进展·····	(218)
二、问题的反思·····	(227)
三、方法的选择·····	(238)
第九章 海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	(244)
一、日本和韩国学者的研究·····	(246)
二、西方学者的研究·····	(255)
三、台港学者的研究·····	(264)

学术研究需要反思

——《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序

蔡钟翔

“学科史”(或专题学术研究史)已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因为学术研究需要掌握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需要了解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已达到的研究水平,需要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这样才能避免重复劳动,虚耗无用之功,才能避免重复失误,再走过去曾经走过的弯路,才能正确地选择主攻目标,在研究的广度或深度上向前推进或有所突破,那么,学科史可以给研究者提供切实的帮助。就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来看,具有学科史性质的论文已屡见发表,如牟世金为《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撰写的《龙学七十年概观》,罗宗强、卢盛江写于1989年的《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都是很有分量的,此外一些专业杂志也刊登过阶段性的研究综述,一些大型工具书如《文心雕龙学综览》也开辟了研究概述的专栏。但是,尽管研究者呼唤这门学科史的出台,却至今还没有一部专著问世。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古代文论研究的圈子不算大,但据我粗略的估计,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论文年产量(包括古代美学)约在六、七百篇到近千篇,专著年产若干种,单是扫描一遍,就得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更为艰难的是评鹭优劣,分辨是非,发现问题的症结,指明前进的道路,这不仅要下踏实的功夫,而且须有高明的识见。学科史是研究的研究,回顾以往,瞻望未来,肩负为学术导航的

使命，毋怪众多学者会望而却步了。现在看到了张海明博士的新著《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我深深地钦佩他执着的毅力和开创的胆力。虽然全书不过二十余万字，还不能说已臻完美，但毕竟是第一部古代文论研究史的专著，从1927年到1996年，时间跨越之长也是前所未有的。作者的投入是很大的，七十年中古代文论研究的主要论著都须涉猎，其广搜博采的辛勤是可以想见的。当然还不免有挂漏之处，部分章节有以论代史的缺陷，还不能全面展示研究的状况，但如果着眼于对研究的反思，就会赞赏作者思考的深刻性。除了介绍性地列举评论各类研究成果外，作者把力量集中在几个理论热点上，如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性、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等，都设立了专门的章节。对于这些一度成为焦点的论题，作者确实经过了深思熟虑，因而能在分歧的意见中抓住要领，或者在某一较合理的观点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生发出相当精辟的见解。

在《对中国古代文论特性的认识》一章中，他提出了“民族特色”概念的界定问题：

我们需要澄清：所谓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究竟是只为中国古代文论所独有的若干特征，还是既体现了某种古今中外共通文心，同时又具备独特的表述形式的部分？也就是说，只是其特殊性，还是某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对于后者，我们则需要区分不同的层面：是理论体系本身的特征，还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特殊表现？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总体特征，还是只属于某些特定领域的具体特征？

在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点的讨论中，可谓众说纷纭，言人人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概念的把握不确定，因此概念的厘清的确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作者把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比拟为

两个相交的圆，接着又提出相交的部分究竟有多大的问题：

如果这部分足够大，那就意味着中西文学理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相反，如果相交部分远远小于不相交的部分，则说明中西文学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我们赞成前一种观点，那么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便只是局部的、外在的；而如果我们持后一种观点，则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就应是整体的、内在的。……

不管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沿着这样的思路追索下去，就把探讨引向更深的层面。作者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把原道观（把文学看作是道本体的外化）作为古代文论体系的核心，这个论点还可以商榷，但不可否认这是一种探本之论，较之以重抒情、重表现为民族特色之类的说法更接近了古代文论的本质。关于民族特色的讨论热潮已经过去，但远没有达成共识，形成定论，作者的反思对于以后的继续深入是有启发性的。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近来又成为文艺理论的热门话题。在古代文论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已涉及这个问题，历经七十年仍然没有解决，因此历史的经验更值得注意。古代文论研究的发轫正是缘于五四以后中西文化的撞击，无论是陈钟凡首创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撰，还是以杨鸿烈、朱光潜为代表的中国诗学的构建，都借鉴了西方的现代文学概念、理论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同时也肯定了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古代文论研究并没有局限于封闭自足的经院式研究。解放以后，古代文论的冷落是由于被视为封建性糟粕而遭摒弃，但时间不长，五十年代末周扬倡议建设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古代文论的研究重新兴起。后来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文革以后，古代文论研究复振的势头很猛，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一再列为中心议题。然后因西方文论的大潮涌

入而降温，直到最近又提上议事日程。由于痛感缺乏民族特色的中国文论在世界上没有自己的地位，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已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历史的追溯显示，古代文论研究的几番起落都和对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的估价密切相关，认识的大幅度摆动延误了研究的进程。但在认识了古代文论的价值之后，问题是否能迎刃而解，实践却告诉我们，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一是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问题，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既不能以古释古，也不应改铸古人，使古人现代化，但由于古今之间失去了延续性，现代概念大都来自西方，因此只要是现代阐释就不可避免地会变形、走样，难以做到真正的“还原”。这种二律背反的两难处境一直困扰着古代文论的研究者们。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融汇吸收古代文论的问题。现在通行的方式是仍然保留源于西方的现代文论框架，而充填古代文论的材料于其中，但这样古代文论终究处于从属的附庸的地位，无以体现中国特色。也有一些学者赞成以古代文论的体系为框架的方案，这样做难度很大，因为古代文论中存在的“潜体系”还有待于发掘探索，而且这种“古色古香”的文艺理论能否与现代文艺相适应也很成问题。看来“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都不理想，那么还有没有第三种选择？本书作者在周密地分析了“延续性和断裂性”、“兼容性和互补性”、“显在性和潜在性”这三种关系之后，提出了一个立足点的问题：“究竟立足于何处，才是建构新理论的理想而又切实的根基？”这的确是解开扣子的枢机所在。他认为：“无论何种选择，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理论这一工程中，中国古代文论确实必须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理论的角度来看，研究古代文论的意义或价值，首先是为理论建设提供一个坚实的根基，同时这个根基又不是传统文论体系的简单照搬，而是经现代意识审视、改造了的产物。在此意义上说，传统是发展了的传统，当代是与传统相承续的当代，如此，我们就不

会在立足点问题上左右为难，进退失据，游移于传统与当代之间”。我们且不论作者是否已为古代文论研究指明了“走出误区”的路线，但作者的结论在大方向上是不错的。必须以传统为根基，但传统与当代之间这条断裂了的线索应连接起来，这里突出了传统的改造，经过改造，“传统是发展了的传统，当代是与传统相承续的当代”，就庶几可以摆脱进退失据的困境了。因此，作者提出，“古代文论要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中发挥效用，前提是激活它，使之与现代接轨”。这个提法很好，先要让古代文论在当前的文艺活动中活起来。在具体的操作上不妨从局部的范畴、命题入手，但不能仅此止步，还应该“考察其理论体系和表现形态方面的意义，由此深入到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的层次，……才能真正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的建设”，否则仍不免陷入镶嵌拼贴的模式。就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来讲，也不能仅仅理解为用相对应的现代话语来翻译，这样势必只能传达其共通性，而不得不抹杀其特殊性，因此应该深入到“人类之心理历程和审美现象”的深层次来沟通古今。眼下恰逢“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在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上展开讨论，张海明这一家之言，是一份较为全面、辩证的答卷，他从纷繁复杂的成堆问题中理清了头绪，找准了核心，一定能推动这场讨论的深化。

七十年来，古代文论从史的研究到比较研究，到范畴研究，到体系研究，一步步向横广、向纵深发展，其中史的研究开始最早，成果也最多，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如今已出版了五卷本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八卷本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正在陆续推出。本书作者在肯定了这些成绩之后，发表了一段很值得重视的议论：

学科研究的拓展，更多的是表现为批评史卷帙的增加，以材料收罗的完备和阐释的细致取胜，而不是表现为执简驭繁，

由博返约，以对历史发展内在轨迹的深刻认识见长。……一部优秀的简史，不应只是繁重之批评史的简写本，它首先必须具备史的意识，能够准确把握批评史发展流变的脉络，于提要钩玄中见出批评史自身的总体特性和内在规律。……

我作为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的作者之一，对这一主张深表赞同，今后史的编写不必再加大加细，更迫切需要执简驭繁，由博返约，写出一部优秀的简史。我们不揣浅薄，正酝酿着一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的写作，我们也意识到简史比多卷本实际上更难写。

张海明博士诚恳地邀我作序，我本来是不具备资格的，因为我没有对七十年来的古代文论研究作过认真的回顾和反思，如今勉强写出，不过是一些粗浅的感想。但读了这部著作，我的收获是很大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更深地领悟了学术研究需要反思。

1997年3月15日

引 言

或许与临近世纪末不无关系，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学科史的研究正开始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在经过纷至沓来的观念变革，方法尝试之后，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感到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作全面系统的总结，以期更好地认识其特征，把握其规律，进而实现学科研究的科学化，并在此基础上将研究推向深入。所以，尽管学科不同，层面不同，但这种总结性的学科史研究的确开始形成一种趋势，一些各具特色的学科史研究著作也陆续面世。

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一般说来，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大体上都经历了三重转折：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近代西学的影响，这对传统观念、思维 and 治学方式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其结果是若干新人文学科的诞生，或旧有学科的重新建构；二是五十年代以后意识形态的更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思想，这一转变同样导致了学术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的革命，使之呈现出不同于先前的新的面貌；三是发轫于七十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使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普遍趋于多元化发展的格局，而且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反思与探索色彩。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历史转折时期的每一个，都是以对

先前研究的批判甚至否定为起点的。虽然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 早先简单化的弊病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 但总体而言,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发展进程基本上是按照不破不立, 破字当头, 立在其中的思路来演进的, 因此, 这种发展进程必然表现为一种“之”字形的摇摆, 一种不断地推倒重建的循环。而经过这样三重转折,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 人们才得以在一个更高的观点上来反观本世纪以来的整个学术历程, 对之进行全面的反思、总结。应该说, 这既表现出学人的心态趋于成熟, 同时也反映出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

中国古代文论或批评史的研究同样如此。如果说,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回顾性文章主要着眼点还只是对文革十年的批判的话, 那么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 人们回顾、反思的视野已转向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 并进而向学科草创时期延伸, 一些经过认真思考, 较有份量的论文开始见诸报刊。至八十年代末更引发了大家的兴趣, 以至于成为专题讨论的重要内容。这本小书的构想与写作, 就是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之下对于七十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的一种思考, 一种述评。

既然是一种述评, 那么, 对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的种种认识、评判, 当然也就有必要在本书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事实上, 它正是本书《引言》讨论的主要内容。我以为, 由此入手, 一方面可以作为认识和了解七十年古代文论研究史的一个捷径, 且可借以展示本书之概要; 另一方面, 本书参考这些回顾性或综述性文章之处甚多, 书中虽已注明, 但散见各处, 故仍应在此介绍其基本观点, 以便读者对之有较全面的了解。此外, 尽管将要介绍的这些文章本身已是对学科史的回顾与反思, 我们仍可以将其作为回顾与反思的对象, 恰如本书日后也不免被人品头论足一样。“后之视今, 亦犹今之视昔”, 学科史研究正是如此。后来者虽未必一定居上, 却有责任检视、述评此前

人们所做的工作，至于所述是否客观，所评是否公允，那是后来者水平、能力的问题，可以尽力而难以尽善了。

就我所见，最早对建国以来古代文论研究进行全面回顾的文章，当是董丁诚的《古代文论研究的崛起》。¹该文有一个副标题：“为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而作”，可见其总编三十五年来古代文论研究情况的意图。不过，文章虽然略述了三十五年来古代文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但主要内容还是对八十年代初期古代文论研究情况的评述。董文肯定了古代文论研究的目标在于建设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新方法特别是比较方法的引入对于开阔视野，重新认识古代文论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古代文论研究队伍的壮大、学术争鸣的风气更表明形势喜人。恰如作者自己所说，写作此文的用意，“不过是表示对古代文论以至整个学术研究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的喜悦之情”。至于这大好局面之后所隐藏的问题，作者尚未明确意识。

张兵于1985年初发表的《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述评》一文，²开始比较系统地梳理总结自五十年代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文章对五、六十年代古代文论研究史作了回顾，充分肯定了这一时期在资料整理和理论研究方面的成就，以之为“我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潮”。与董丁诚文相似，张文的重点也在新时期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所不同者，张文从资料工作、史论研究和队伍三个方面对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的进展择要作了述评，并在总结经验的同时，提出了一些当前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其中有些如古代文论研究应联系文学史上的创作实际，加强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等，在此后发表的同类论文中得到应和。同年刊出的牟世金《古代文论研究现状之我见》，是一篇经过认真思

1 董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后收入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选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集》。

2 张兵文载《齐鲁学刊》1985年第1期。

考，颇有见地的总结性论文。^①作者的意图，在于认清古代文论研究的现状和探讨今后发展的方向。所以，文章在肯定古代文论研究已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指出古代文论研究“近年来不仅已迅速进入它的茁壮成长时期，且面临着一个急剧的变革和深化时期”。牟世金认为，古代文论研究在八十年代的长足发展主要得益于思想解放和新方法的运用，而目前存在的问题亦在思想的继续解放和不同方法的相互补充。牟文还特别提到了对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研究应着眼于本质性、规律性、全局性，要端正学风，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阐发和资料整理结合起来，在“从容按节”的基础上实现“长轡远驭”。与前两篇文章相比，牟文更多冷静的思考，更侧重探求现象之后的根源，对存在问题也有着更敏锐的感受。

也就是从牟世金这篇文章开始，对古代文论研究之历史与现状的思考、对存在问题及解决途径的探寻逐渐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课题。此后陆续发表的同类文章，重心都移在了这一方面。如吴调公的《老树新花的启示——新时期十年古代文论研究随想》明确指出，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发展的第一步，“是对过去研究的自我反思”，而只有处在随体制改革而来的历史转折时期，“站在十字路口的人们才有可能进行理论上的反省”，正是因为有这种反省，这种前所未有的自觉，新时期十年的古代文论研究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高潮。具体些说，即是有意识地将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研究结合起来，将历史的研究与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既有对古代文论的整体辨识，又有对特定理论家及其著作个性的深入探讨。吴文认为，“以人中心，由此多维地探求古代文论家的心灵，探求作用于他们的群体意识”，是为新时期十年古代文

① 牟世金文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

论研究所给予的启示。^①张少康的《古代文论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一文在肯定十年来取得成绩的同时，着重则对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的学风不正现象作了批评。文章概括了学风不正的四种表现，即：轻率概括、实用主义、辗转引用、望文生义，以之为影响研究深入的主要障碍；进而指出，古代文论研究要想有新的突破，除了具备严谨的学风之外，还必须做到三个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理论批评研究和创作实际研究的结合，古与今、中与西的科学结合。^②应该说，无论是对新时期十年古代文论研究取得的成绩的肯定，还是对存在问题的批评，这两篇文章的见解都是公允的、客观的，所进行的思考、提出的意见也是具有建设性的。作为长期研治古代文论的专家，他们对这一领域的发展变化自然有着真切的感受。

不过，若论见解之深刻，褒贬之得当，述评之全面，则无疑是罗宗强、卢盛江二人于1989年撰写的长达两万余字的《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③这篇文章所以给人高屋建瓴、深稳厚重之感，并非因为它的篇幅，或讨论的范围超出了新时期十年，而在于作者通过对四十年古代文论研究史的回顾，更为深入地把握到存在问题的实质，并以一种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存在的问题，从而后来居上。文章首先指出，迄今为止，关于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我们一向主张的为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服务，其实并不就是研究目的的全部，除此之外，古代文论的研究还可以有助于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帮助我们了解、研究历史，为文化承传服务。“有时候，对于历史的真切描述本身就是研究目的”。作者并不反对古为今用的提法，然而，“把视野人为地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对于研究领

① 吴调公文载《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1期。

② 见《求索》1988年第2期。

③ 见《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

域的拓展、方法的选择、价值的衡定，都会有不好的影响”。其次，作者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论研究的主要精力是用在理论分析上，成绩不小，但值得思索的问题也不少。譬如还不适应理论论证的严密性要求，在理论分析中往往表现出模糊不清、感想式的毛病；同时，我们也未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未能创造出自己的研究方法，而大多是套用、照搬。至于资料工作方面的进展，则不及理论研究，有待改进，甚至填补空白之处也较理论研究为多。如资料的收集、汇编，史实的考订，工具书的编纂等等，都还不尽如人意。资料工作的滞后，“使我们的整个研究工作缺乏一个较为坚实的根基，也限制了理论分析在更高学术水准上的开展”。最后，文章还重点讨论了如何处理当代意识和历史实感的关系问题。作者承认古代文论研究必须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现代文学理论的成就，以弥补古代文论在表述上不够严谨确切的欠缺，进而对古代文论的范畴、命题作出明晰的界说和科学的阐发。然而，作为一种史的研究，“我们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运用理论思维和现代文学理论成就，是为了更确切更严密地阐释与评价古文论，还它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决定取舍，而不是以现代的面目去改装它”。所以，古代文论的研究必须强调历史实感，必须把还原工作摆到首要的位置。具体些说，应该结合特定的创作实际、文化背景和文论家独特的生平思想来进行研究，从而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反思》是一篇具有相当力度的深思熟虑之作，尽管文章对有些倾向、认识的批评未必会被所有人认可，但它提出的问题却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它对研究目的、方法多元化的呼吁，对资料工作和历史实感的强调，的确给当时的古代文论研究界以警醒。文章本身也写得严谨、通达，反思色彩颇为明显。可以说，这篇文章的出现，标志着我们对古代文论研究的认识进入到一种成熟的心态。

1989年3月，《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京、津两地二十几位研